为人保险者莫走险路

木 木

金庸笔下的主角命都比较好,不是机缘巧合得到了人人梦寐以求的“天书”,就是获得世外高人的垂青,倾囊相授甚至是倾命相授,即使得了怪病、绝症的,也往往能化险为夷、因祸得福,反正最后都能练得一身的绝世武功,年纪轻轻就扬名天下。看得出来,每每写到此处,金老侠客总是欣欣然不忍辍笔;“金丝”们每每读到此处,亦熏熏然如饮佳酿,不忍辍口。

中国人喜欢走捷径的劲头儿,由此可见一斑。不但当官、读书、讨生活,往往梦想寻得终南捷径;即便化外的和尚,念经、敬佛、敲木鱼,也时时希望一朝顿悟,鸡犬升天。但造化弄人,历史经验却又屡屡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少有捷径。可是古往今来,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气儿,满世界搜寻捷径的,真如过江之鲫。其结果,往往闯来的是一条险路、死路。而少数依着聚沙成塔、循序渐进“笨方法”的做事者,倒往往能够迎来豁然开朗的一片新天地。

喜欢走捷径的,在当下保险业里也是大有人在。虽然按照官方教科书上的理论,保险业是风险保障的提供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阀,安全性的是其一切经营活动的基石。但是,这些为别人、为社会提供风险保障的人,一旦在现实中运作起企业来,本本儿上的条条框框就马上抛到九霄云外去,个个儿喜欢剑走偏锋。而剑走偏锋,虽或能赢得一时的快意,但也往往给企业、行业发展埋下“地雷”。

就以保险业的“投连险疯狂”为例,其发病已非首次了,每当资本市场火爆起来后,总有些人看别人挣钱眼红,耐不住寂寞,也急吼吼地闯去捞一把,而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正是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时候,在某“新贵”公司的投连新品发布会上,就新产品的风险问题,公司某高管自信满满地说,“这个产品的风险,我们可以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上。当投保人股票账户的风险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其投资资金随时转入其他高收益的、安全的账户;当证券市场走好的时候,我们又可以随时把资金转回来。这样,我们不但替投保人有效控制了资金风险,而且还能使其获得超出预期的收益。”

理论上,该高管的算盘确实拨弄得无懈可击,投保人大可放心购买,然后回家睡大觉,等着数钱。但高管们却没有告诉投保人,按动账户划转触发键的那只手到底是从哪个皮袄袖筒里伸出来的。

现实是巴菲特并未满天飞。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即在于,明明殷鉴不远,可总有后来人相信自己偏能跳出规律,一伸指天画地的胸襟。随着一些大卖投连险的公司保费规模、市场排名的突飞猛进,不但这些公司的信心膨胀,而且也裹胁一些“好孩子”加入到抢夺市场份额的“闹剧”中。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名副其实的“小不点儿”,今年前三季度的保费规模尚不足6亿元。但公司对保险本职的专注,使其发展质量、偿付能力堪比任何一个大公司。其不求规模、深耕细作的作风,也赢得了整个行业的尊重。

再比如新华保险。在许多著名的聪明人纷纷加大投连险等产品的开发、营销力度的大环境下,面对市场诱惑,新华保险倒颇有些“入定老僧”的风范,在市场排名、市场规模、知名度等指标被超越的情况下,仍坚守既有的发展策略,稳扎稳打,即使其间爆发了震动一时的“关国亮事件”,公司的发展方向也未因此发生漂移。到今年9月份,在失去2年又8个月后,新华保险重回寿险市场“老四”的位置(距“老三”不过仅有10亿之遥)。而此时,当年的明星们正在为当年的冒进而痛调结构、狠抓风险。

规律终归要发挥作用。事实再一次证明,做企业、做事业,来不得半点取巧之心。尤其作为社会经济“安全阀”的保险业,更不能心存侥幸,履危涉险,拿别人的钱练自己的手。当投保人、被保险人都觉得不踏实的时候,整个行业“做强做大”就成了一句空话。虽然从目前情况看,保险业调结构、控风险取得了一定实效,但为了保证行业不接二连三地掉进同一个泥淖,显然还需要推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应对措施。

焦点评论

财经时评

提高劳动所得不能纸上谈兵

舒圣祥

年终将至,《人民日报》记者在探访了不同人群生活状态后指出: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居民生活质量不高——《人民日报》的记者调查给我们展现出的无疑正是这样的图景。事实上,这已经算不得“新闻”,而近乎一种常识了。反映到公众生活经验上,其实就是“什么都涨,唯独工资不涨”,反映到统计数据上,问题则更加直观: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确实,当人们在年终盘点收入的时候会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正变得越来越难。而与此相关的“硬币另一面”则是:想要致富就不能不眼红快钱——如果没有安阳彩民买彩票中三亿的运气,至少也得炒炒股炒炒楼想要致富就不能转走捷径,有丁点儿权力都想要变现为个人利益,有丁点儿机会都想要通过公关致胜,甚至于想要致富就不能不“狠一点”——只要能赚到的昧良心也要去赚,只要能搞到的犯点法也要去搞。

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人民日报》的报道看到了“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巨大差距,提出应该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所得”比例的观点。虽然这样的关切初衷很好,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此简单地评述提高劳动所得多少有点“纸上谈兵”。企业职工的工资,岂是谁能随便“勒令”上涨的吗?几十年前我们批判“万恶的资本家”那一套,注定是没有用的。

虽然确实有很多“血汗工厂”,虽然确实有很多黑心老板,但在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大问题面前,在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之路上,提高劳动所得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关键,更不是最可操作的问题领域。比如,在公共福利保障上的福利兜底和福利倍增,就要远比提高劳动所得更为可行。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强力压缩“三公消费”节省行政开支,能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的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人们在年终盘点生活也许就不会那么叫苦了。

再比如,一些利润丰厚领域尽被国企垄断经营,左手拿财政补贴,右手向公众涨价,不仅造成“一年到头尽为垄断巨头打工”的公众悲叹,更严重伤害了市场竞争,遏制了更多高收入岗位的市场供给;再有,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5万亿新增贷款能给提供多数就业岗位的私企多分一点羹,土地财政与高企房价能够得到更有力控制,个税制度能够在平衡穷富方向进行完善,工会组织能够更健康地发育和活动。诸如此类,所有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方面,其实都是在一个大话题的范畴之内。

央企为何热衷衍生品投机

周义兴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新一期《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截至2008年10月底,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品业务浮亏114亿元。他指出,央企金融衍生品业务发生的巨额亏空和损失,教训深刻。究其原因,企业追逐高额利率套利投机是要害所在,另外,违规越权操作、风险控制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也值得深刻反思。

对此,在分析央企偏好金融衍生品投机原因问题上,或许正如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所说,其中有违规越权、风险控制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等多种原因。应该承认这些分析是客观的。然对此笔者同时也认为,造成央企对金融衍生品业务投机嗜好还有一个重要成因无疑应该是——监督失效与权责失衡。

首先就央企现有体制看,众所周知,对在有效监督制度缺位前提下的投资行为,在投资经营业界早有一段名言:拿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既不讲效益也不讲节约;拿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会不讲节约而只讲效益;而只有拿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才会既讲节约又讲效益。假如我们承认这段名言正确,并据此对央企的相关投机行为进行分析,那就显然不难发现,在当前央企考核环境下,如果相关的央企拿着国有资金从事投机行为,一旦在市场能够幸运地取得成功,那相关的央企官员或许不但不会因为自己的投机行为受到责难,相反还可能取得功成名就的结果。而倘不幸失败,想除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陈久霖因触犯当地法律而受处罚外,其他在国内,社会公众似乎并没有见到央企官员因违规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而受到处罚的消息面世。这说明了什么?至少在笔者看来,如此央企投机行为的存在,应该就是一种“拿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体制缺陷下,所产生的必然恶果。而根本原因则无疑是国有财产真正“主人”监督的缺位。

其次以央企现有的权责关系看,想其实从这次68家央企浮亏114亿元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能够动用如此之大的巨额国有资金且从事的是金融衍生品投机交易,而且还是违规越权行为。所以在此条件下,也许社会公众忍不住想问的是,既然这些央企的投机行为已经违规越权,那相关的责任人现在在哪里?又是否已经承担了责任?而承担的又是怎样的责任?而如还没有追责,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又是否也是国资委作为监管机关的失职?想这,无疑是国有财产的主人,也就是全体国民有权了解,并同时也是国资委有义务向社会公开的公共事项。

所以,面对68家央企从事投机交易而浮亏114亿元的事实,想对相关监管机关来说,应该,也有义务要好好找一找其中为什么会、为什么能、为什么敢的根本原因,并就此进行一番反思才是。

煤老板闻风卖矿根在政务透明度差

毕晓哲

据媒体近日报道,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厅等部门正在联合调研,以制定煤炭业重组的具体政策。部分中小煤矿担心煤改风暴,欲将手中煤矿卖掉,而省内的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则闻风而动,盘算早日跑马圈地,抢得先机。

所谓的一个“拟”,也仅仅是有关政策制定部门在考虑而已,而且该省重组煤矿的工作尚未实施,为什么一些小煤矿老板就“坐不住了”,纷纷要将手中的煤矿卖掉呢?

当然,对于未来的收益和损失情况,及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是每一个商家的理性举动。商家永远是趋利的,如果一项新的举措可能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一定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譬如迫不得已“甩卖货物”等等。

事实上,当地煤老板们有着这种近似于“疯狂”的闻风卖矿行为,也不能完全怪商家过于敏感。总体而言,每一次重组或整顿,部分老板受益但也不能否认的确有大量小煤矿老板“血本无回”。以山西省正在进行的煤矿重组整治风暴来看,部分煤矿投资者其实是不太情愿的、也是“吃了亏的”。按照山西省煤炭企业重组规划,这些被迫重组掉的小煤矿补偿评估分三部分:固定资产,如地面建筑、矿井设备投入等;已缴纳矿山资源费的补偿返还;其他损失补偿。除了固定资产评估上的分歧外,煤老板们普遍对矿山资源价款补偿反映强烈,这就是利益无法得到有效弥补和保障的反映。煤老板不是“傻子”,他们会核算是让重组掉合算还是提前卖掉更合适,因此,出现闻风卖矿行为实是必然。

但是,一个“拟”重组的传言,就将当地的小煤矿老板“吓”成这样,政府部门应该反思。首先是应该反思反思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否。实际上,如果政府政策政务信息是公开透明的,经营者能够经营多少年、获得什么收益也是可预期的,煤老板们自然会多一些理性,也不至于“临时抱佛脚”突击卖矿。另外,对于决策和举措的连续性也应该增强,更不要因决策过于随意,而让经营者们对公权、公权行为造成“惶惶不可终日”的现状。看来,如何最大限度维护投资者利益,应该引起有关方面重视了。

实话实说

财经漫画

隐性收入何其多

李向东/图

迪拜事件预警中国地产泡沫神话

姜 山

在全球市场为摆脱金融危机而欢欣鼓舞之际,迪拜世界的债务违约事件给予了过度兴奋的投资者重重一击,尽管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一危机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去年的雷曼倒闭并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也的确隐藏着不少具有启示性意义的深刻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作为主权基金,迪拜世界的规模并不算小,这次违约是自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以来,最大的主权债务违约事件。迪拜世界的主要投资方向在于地产和旅游业,由于富庶的中东地区囤积了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大量的富商聚集使得迪拜成为了全球顶级奢华的代名词,摩天大厦和超五星级酒店鳞次栉比,商业房地产价格自2003年以来出现飞升,吸引了更多的逐利资金进入迪拜寻求增值机会。

但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资大规模流出和货币贬值成为迪拜世界危机的导火索,商业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降,资金的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迪拜世界最终难以承担巨额到期债务,提出了延期偿付的申请。有分析预计,接下来由于迪拜世界将被迫处理手中的大量商业房地产资产,本已在此次金融危机之中遭遇严重打击的房地产市场将会雪上加霜,一些在商业房地产中有大量投资或者放贷的基金亦或银行将面临严重的损失。

鉴于雷曼兄弟倒闭的前车之鉴,阿联酋政府不会放任迪拜世界倒闭,让其成为新的金融危机引爆器,这一点从上周末阿联酋央行以及阿布扎比主权基金的相关表态中可见一斑。而迪拜世界自身也并不具备如大型金融企业一般的连锁破坏性,只要处置得当,即便相关的债权人和股东会遭遇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并不会导致其他的金融企业遭遇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现象产生,一些认为迪拜世界债务危机将是第二波金融风暴开始的想法看起来有过度悲观的嫌疑。

然而,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凸显了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敲响了新的警钟。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跟随城市化进程和住房货币化的脚步,在大量资金涌入的带动下出现了迅猛上涨,其中虽然间或有所回调,但均未能形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2007年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力图阻止房价过快上涨,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后,这些限制早已悄然淡出,而为了保证实体经济的恢复,去年年底对于房地产市场更采取了多项扶持措施,在大量信贷投放和政策鼓励下,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2009年创出新高,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正在悄然放大。

虽然有人认为诸如上海这种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红利结束之后,仍然会因其成为外地资金的流入地而保持高房价的水平,但迪拜世界所遭遇的危机无疑给这种想法以沉重一击。所谓人力有时而尽,过度依赖于外部资金而非本身实质性需求的市场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美丽而虚幻的肥皂泡终究会遇到破灭的时候,这种泡沫吹得越大越持久,在破灭时所形成的冲击和破坏力度就越强,其不利后果也就会越难以挽回。当中国的经济成长遇到瓶颈而无法突破之时,单单依靠资金推动的房地产巨人就会难以支撑其庞大的身躯,最终面临轰然倒地的命运。因此,如何做到未雨绸缪,尽早地抑制房地产泡沫,使其控制在适当的水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消除,应当是有关部门在实体经济逐步稳定发展之后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系东航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

他山之石